

目錄

總序 余英時

編序 康 樂

《韋伯選集》導論

I. 韋伯小傳	3
II. 韋伯的政治關懷	41
III. 韋伯的學術	59

學術與政治

導言：韋伯論學者與政治家	91
I.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115

開場 117 年輕學者學術生涯的外緣條件：德國與美國 117
 學術研究機構的“國家資本主義化” 119 學術生涯中的機
 運問題 119 學者與教師的難以得兼 121 學術生涯外緣條
 件的總結 122 學術的專業化 123 靈感在學術工作中的地
 位 124 當前流行的“人格”論 126 學者的“人格” 126

何處尋覓學術工作的意義 127 理知化的主要意義 128 進步與死亡的意義 129 學問的價值——問題的提出 130 前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130 概念的發現之意義 131 理性實驗的興起 132 近代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132 學問的價值作為學術工作的預設 134 價值預設與各類學科的關係 135 政治不屬於課堂 136 為什麼政治不屬於課堂 137 學術求於信徒者——一個例子 138 “令人不快”的事實” 139 價值的多神論 139 “美國年輕人對教師的態度 142 教師不是領袖 142 教師對學生的“生命”所能提供的幫助 143 對學問的認定和獻身 145 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 146 神學的預設——理知的犧牲 147 學者沒有犧牲理知的權利 149 面對“眼下的要求” 149

II.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153

開場 155 政治的初步界定 155 國家在社會上的定義 155 政治的定義 156 正當性的三種純粹類型 157 卡理斯瑪型支配 158 從支配者到支配運作的資源 159 支配之經營的兩項要素——人與物 159 人的因素：行政僚屬 159 物的因素：行政工具 160 身分制政治團體 160 君主擁有行政工具 161 近代國家對行政工具的收奪和壟斷 161 新型職業政治家的出現 162 政治作為副業與政治作為主業 163 “為了”政治而活和“依靠”政治而活 164 資產對職業政治家的意義 166 專業官僚的興起 169 首席政治家的出現 170 政治官吏和專業官吏 172 職業政治家的性格和類型 174 僧侶 174 文人 174 宮廷貴族 175 士紳 175 法律家 175 律師和官吏的不同性格 177 官吏和政治家的不同

性格 178 群眾政治家 179 新聞工作的特殊地位 179 新聞工作者的缺乏餘裕 180 新聞工作的政治前途與艱辛 181 黨工 183 政黨經營型態的起源 183 政黨在英國初起時的型態 184 政黨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186 政黨組織的獨立和強化 187 黨工的期待 188 政黨新舊型態之間的衝突 188 早期英國政黨的組織 189 黨務會的崛起 190 新式政黨機器在幾個方面的影響 192 英國新式政黨機器下的領袖 192 早期美國政黨的發皇 193 獵官制 194 黨老大 195 美式官吏制度的變化 197 在德國政治工作的三項基本態勢 197 德國政黨的望族宗派傾向 198 新式政黨機構的出現和領袖的關係 200 領袖民主制的前景的前景和機會 200 志業政治家的出路 202 政治作為志業的心理意義 202 志業政治家人格上的條件 203 虛榮的破壞力 204 信念以及價值對政治行動的意義 205 政治的道德地位 206 自鳴正義的道德和責任的道德 206 道德和政治的離與合 208 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 210 目的與手段之間的緊張關係 211 用目的來聖潔化手段的困難 212 惡的存在之事實 213 倫理的多元論 214 以武力為手段的後果 216 志業政治家應有的警覺 217 能以政治為志業的真人 219 艱苦前途的考驗 220 政治作為一件工作的真義 221

III. 附錄

- (一) 韋伯兩篇演講的性格 225
- (二) 韋伯兩篇演講發表的日期 231

註釋	235
索引	279
人名對照表	285

總序

這一套《新橋譯叢》是在臺灣新光吳氏基金會獨力支持下進行編譯的。其範圍廣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幾個最重要的部門，包括哲學、思想史、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我細審本叢書的書目和編譯計劃，發現其中有三點特色，值得介紹給讀者：

第一、選擇的精審 這裏所選的書籍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學術史上的經典作品，如韋伯（M. Weber, 1864-1920）和涂爾幹（E. Durkheim, 1858-1916）的社會學著作。經典著作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作者雖已是幾十年甚至百年以前的人物，但是他們所建立的典範和著作的豐富內涵仍然繼續在散發著光芒，對今天的讀者還有深刻的啟示作用。第二類是影響深遠，而且也在逐漸取得經典地位的當代著作，如紀爾茲（C. Geertz）的《文化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布洛克（M. Bloch）的《封建社會》（*La société féodale*）、孔恩（T.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勞爾思（J. Rawls）的《公道理論》（*A Theory of Justice*）等。這些作品是注意今天西方思想和學術之發展動向的中國人所不能不精讀的。第三類是深入淺出的綜合性著作，如帕森斯（T. Parsons）的《社會演進》（*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伊格思（Georg G. Iggers）的《歐洲史學的新

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契波拉 (Carlo M. Cipolla) 主編的《歐洲經濟史論叢》(*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這些書的作者都是本行中的傑出學人，他們鉤玄提要式的敘述則可以對讀者有指引的功用。

第二、編譯的慎重 各書的編譯都有一篇詳盡的導言，說明這部書的價值和它在本行中的歷史脈絡，在必要的地方，譯者並加上註釋，使讀者可以不必依靠任何參考工具即能完整地瞭解全書的意義。

第三、譯者的出色當行 每一部專門著作都是由本行中受有嚴格訓練的學人翻譯的。所以譯者對原著的基本理解沒有偏差的危險，對專技名詞的中譯也能夠斟酌盡善。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譯者全是年輕一代的學人。這一事實充分地顯示了中國在吸收西方學術方面的新希望。

中國需要有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瞭解西方的人文學和社會科學，這個道理已毋需乎再有所申說了。瞭解之道必自信、達、雅的翻譯著手，這也早已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了。民國以來，先後曾有不少次的大規模的譯書計劃，如商務印書館的編譯研究所、國立編譯館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都曾作過重要的貢獻。但是由於戰亂的緣故，往往不能照預定計劃進行。像本叢書這樣有眼光、有組織、有能力的翻譯計劃，是近數十年來所少見的。我十分佩服新光吳氏基金會的深心和魄力，也十分欣賞《新橋譯叢》編輯委員會的熱忱和努力。我希望這套叢書的翻譯祇是一個新的開始；從初編、二編、三編，不斷地繼續下去。持之以恆，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一定會從翻譯進入創造的階段。是為序。

余英時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

編序

《新橋譯叢》編輯委員會決定編譯瑪克斯·韋伯的經典著作，蓋認為將這些作品譯成中文，對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之研究，當大有助益。

編輯委員會經過多次審議，初步決定編譯一套《選集》，分別就政治、宗教、法律及方法論各層面選譯韋伯作品，俾初學者得有一入手的把柄。其次，為韋伯若干經典之全譯，如《經濟與社會》、《中國的宗教》，以便讀者得窺韋伯學術之全貌。該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此原則，編輯委員會最後擬再精選最近西方學界有關韋伯學術之研究，或譯為專書，或匯為論文集出版，供國內學界參考。藉此三項工作，《新橋譯叢》希望能將韋伯學術有系統而完整的貢獻給中國讀者。

韋伯學術之博大精妙，其德文原著之難深複雜，已為世所公認。編譯小組工作同仁中，能深諳德文，直接從原著翻譯者，不得一二。不得已，乃以英譯為底本，並參照日譯本或法譯本，有抵牾處則逕取德文原作校訂，務求於傳述原意方面達最可能之精確。雖然如此，《新橋譯叢》編輯委員會仍極盼他日能有學者再就德文原作重譯，庶幾國人終能得有一更完善之韋伯譯本。

翻譯是一種事業。或者，套個韋伯常用的辭彙，翻譯更應該是一

種“志業”。《新橋譯叢》秉此精神從事譯事，並將成果貢獻給社會。
是為序。

康樂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七日

《韋伯選集》

導論

這篇韋伯的傳記，譯自 H.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trans. &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1946), pp. 3-31。原文是 Gerth 和 Mills 為他們編譯的這冊英文韋伯選集所寫的導論的一部份。

這篇文章的中譯初稿，係由林振賢先生執筆；林君的譯稿，由羅久蓉女士作了詳細的校訂修正；最後再由錢永祥校改定稿。在定稿過程中，我們參考瑪麗安妮韋伯的《韋伯傳》，對原文中關於人物、事件、日期及文字的若干錯誤或混淆之處，作了一些修正。Gerth 和 Mills 在引《韋伯傳》的時候，根據的是1926年的德文版；在譯文中，我們將這些引註全部改為英文版的頁數。另外我們也添加了一些引註和註解。

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是在1940年代；它所假定的讀者，是當時的美國人。這一點，請中譯本的讀者在閱讀時務必記在心裡。這四十年來，關於韋伯的家庭、生平、政治活動、學術生涯，有數量龐大的新材料和新研究出版。今天的人若再要寫韋伯的傳記，所用的概念架構和解釋工具也應該會比較深入，比較細緻。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人一定會用相當不同的歷史角度來看韋伯的時代和生平。我們選譯 Gerth 及 Mills 這篇文章，只是因為它以適當的篇幅，大致忠實地敘述了韋伯的一生；這篇文章只是韋伯的一個“小傳”，而不是讓我們對韋伯形成意見的根據。

1864年4月21日，韋伯生于屠林根(Thüringen)的艾福特城(Erfurt)。父親老瑪克斯韋伯(Max Weber)出身於德國西部一個麻布商和紡織廠主的家庭，是位訓練有素的法律家與市政議員。1869年，韋伯一家人移住柏林。該地不久即成為俾斯麥帝國的興盛首都。在柏林，老韋伯成為一位成功的政壇人物，活躍于柏林市議會、普魯士邦議會和帝國新國會，屬於漢諾威(Hanover)貴族班尼格森(Rudolf von Bennigsen)所領導的右翼自由黨。韋伯一家定居在柏林西郊的夏洛騰堡(Charlottenburg)，所毗鄰者皆為學界與政界知名之士。在父親宅第中，小韋伯認識了狄爾泰(Wilhelm Dilthey)、莫姆森(Theodor Mommsen)、史密德(Heinrich Julian Schmidt)、茲貝爾(Heinrich Sybel)、崔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和卡普(Friedrich Kapp)這些[當時學術界和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

韋伯的母親海倫娜韋伯(Helene Fallenstein Weber)信仰基督教新教，開明而又有教養。她的家族是屠林根的老家族，出過不少教師和小官吏。不過她的父親卻是位頗有資產的官員，1848年革命前夕，退隱於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莊園。著名的自由派歷史學家葛偉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與她家私交甚篤，曾教導她一些人文學科的課業。一直到1919年海倫娜韋伯過世為止，韋伯與他母親保持著篇幅甚長、親密而往往博雅的書信往來。在柏林，海倫娜韋伯成為一位負擔沈重的家庭主婦，全心全意的照料她忙碌的政治家丈夫、六個小孩以及持續不斷的交際圈。她的孩子中有兩個早夭。柏林勞工階級的悲慘境遇，給她深刻的刺激。她的丈夫既不了解、也不接受她的宗教上的與人道的關懷。他可能根本不曾進入她的情感生活，而

他們對許多社會問題意見的分歧，乃是不爭的事實。就這樣，在韋伯幼年及少年期的成長過程中，他雙親間的關係日益疏隔。

家庭來往的知識界友朋和四處旅遊，使得早熟的韋伯對學校千篇一律的教育方式深為不滿。他在四歲時曾罹患過髓膜炎，是個身體孱弱的孩子；酷嗜書本而不喜運動，他在少年時期廣泛地閱讀，並發展出自身在智識上的興趣。十三歲時他就寫過歷史論文。其中一篇題為〈有關德國歷史的發展過程，特別著重德皇(*Kaiser*)與教皇的地位〉；另外一篇則「獻給微不足道的自我，以及雙親和手足們」。^①十五歲時，他便像大學生一般讀書，廣泛地摘寫札記。似乎從早年開始，他就致力於持平適中而有限定的論斷和敘述。他曾對其同窗忽略司各脫(Walter Scott)的歷史小說而只顧耽讀當代無聊作品的低劣口味，加以批評，但他隨而小心翼翼地補充道：「我採取這種立場，看起來或許相當傲慢，因為我到底是班上年歲最小的同學之一；不過，此一情況是如此的刺眼，現在我用這種方式說出，倒不必害怕我所說的不是實情。例外的情況當然總是會有的」。^②韋伯對於他的老師似乎也缺乏衷心的尊崇。雖說如此，由於在考試期間，他十分樂意把自己所知道的與同學們分享，他們認為韋伯不但討人喜歡，而且多少有幾分才氣。

「在俾斯麥“權力政治”(*Realpolitik*)的時代身為政治家的兒子」，少年韋伯認為西塞羅(Cicero)在文學上所受到的普遍推崇，是沒有根據的欺人之談。在他眼裡，西塞羅——尤其是他在關於卡蒂藍(Catiline)的頭一個演說中所表現的^③——只不過是個擅於字眼的文人、一個低劣的政治家、一個沒有責任感的演講者。他試著將自己比作西塞羅，自問這些高談闊論的演說能有什麼有用的作用？他覺得西塞羅應該“除掉”卡蒂藍，用武力消滅掉這場可怕的陰謀。在他寫給一位表兄討論這些問題的信中，在經過詳細的論證後，他結語道

：「簡言之，我發覺此一演說，立論非常薄弱而且沒有意義；他的整個政策就目標而言游移不定。我認為西塞羅根本沒有足夠的決斷與精力，也缺乏技巧，更談不到有伺機而動的能力」。^④就讀柏林大學的這位表兄，在回信中暗示，年少的韋伯只不過是拾他讀過的書的牙慧。為了替自己辯護，韋伯尖銳但保持風度地反駁說：

你所寫來的信，似乎認為我抄襲某些書籍，或者至少是說我掠取所讀過書籍的要點，以為己有。簡言之，這就是你長篇大論的要旨所在。你小心翼翼可能不著痕跡的提出這一點，只因為你以為我會介意一個我知道並不合於實情的意見。雖然我動用了我所知道的全部知識，我還是無法承認我被任何一本書或老師的任何言辭牽著鼻子走。……當然，……一般而言，我們年輕的一輩，自你們年長的一輩（我認為你是其中之一）所積累的智慧中獲益匪淺。……我承認一切事物皆可能間接源自書本，因為書本除了就人所無法了解的事物，對人有所啟發和指導，還有何用？有可能我對於書本中的說法和演繹異常敏感。關於這點，相信你比我有更好的判斷，因為就某些方面而言，了解他人要比了解自己來得容易。至於我論述的內容——或許完全不正確——決非直接抄自任何一本書。至於其他，我並不介意你的批評，因為我最近才發現，莫姆森的書裏面也說過類似看法。^⑤

韋伯的母親在兒子不知情的情況下，閱讀兒子的通信。她極擔心自己與兒子在思想上日益隔閡。像韋伯這樣一個認真而聰明的成長期的少年，既然意識到雙親之間有問題存在，觀察到了一個維多利亞式的父權家庭裡面所特有的障眼手法，自然會學到不能從表面來看人說的話和做的行動。他逐漸認為，如果要了解真相，必須要靠直接的第一手知識。所以，當他被送去參加“堅信禮”的課程時，他把希伯萊

文學到能夠讀原文的舊約聖經的程度。

韋伯夫人為兒子對宗教的淡漠而憂心忡忡，她寫道：

瑪克斯堅信禮的時間愈接近，我愈看不出這段成長的階段對他有什麼較深的影響，好讓他去把他要在聖壇前當成自身的信念而宣告的東西拿來思考。前幾天，當我們單獨相處時，我試著想了解他對基督教意識的主要問題的想法與感受。他似乎很驚訝，我會假定所有有思想的人，都會因為堅信禮課程，而對自己弄清楚諸如對永生的信仰、神意引導我人的命運等這類問題。對於這些在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信念——其形式一點都不重要——我的內心深處有最溫馨的感受……可是我卻沒有辦法把我的信仰，向我的親生兒子表達出來，對他產生任何影響。^⑥

帶著這一份深厚而屬於個人的敬虔心緒，海倫娜韋伯為其表面家庭生活的俗世傾向所苦。雖然如此，她依然以愛心承受她丈夫造成的那種自滿、自以為在道德上優越、以及父權式的氣氛。在成長期的韋伯，在嚴肅的問題上，愈來愈無法和他的母親溝通。這倒不是因為他開始受父親影響；近代知識生活的現世氣氛，使他既遠離父親的庸俗，也推開了母親的敬虔心態。

韋伯對長輩尊重，但他反抗他們的權威。不過，他並沒有參加同學們“輕浮”的活動、學校的刻板生活、和老師們在思想上的空洞無聊；他只是遯入自己的世界。這樣的一個孩子，自然不會接受父親的指令。父親如何毫不體貼地利用妻子，沒有逃過這個十七歲的孩子銳利的眼光。有一次，當韋伯和父親在義大利旅行時，因為沒有足夠地表現出典型觀光客應該有的興緻，遭父親責罵。韋伯的反應是乾脆明言他打算立刻獨自回家。

韋伯在堅信禮中得到的經文是：「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得以自由」。^⑦ 韋伯的遺孀在她寫的傳記中如此說：「經文中再沒有別的句子，更好地表達了支配這個孩子一生的律則」。^⑧

二、

1882年春天，韋伯結束了大學前的求學階段。由於秉賦優異，他並沒有必要“過份用功”。不過，他的老師們卻指出，他缺乏持之有恆的用功，並懷疑他在“精神上的成熟”。像許多十九世紀的思想家一樣，韋伯給他中學老師留下的印象相當惡劣。這位年僅十七歲、肩膀下垂而身材瘦長的年輕人，仍然缺乏對權威適當的尊重。

韋伯進入海德堡大學，箕裘乃父，攻讀法律。他也研習包括文學、經濟學和哲學在內的人文學科；在當時的海德堡，這些科目的教師，都是卓越的學者。靠著父親的關係，他接觸到一些圈子，其中包括他成為他父親所屬的決鬥兄弟會（dueling fraternity）的預備會員。至於母親這一方面的關係，他的一位表兄，是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歷史學家鮑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的兒子，正在海德堡讀神學；經由他的引介，韋伯參與了當時神學與哲學方面的爭論。

韋伯每天早起，先上一堂邏輯課。然後他在擊劍房「晃蕩」一個小時。聽課的時候，他「用心聽講」，十二點半「花一馬克」吃午餐，偶而也會叫杯四分之一公升的葡萄酒或啤酒。時常，在午後他會玩兩個鐘頭「認真的紙牌戲」。而後，他回到自己的房間，整理聽課筆記，並且閱讀諸如史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的《舊信仰與新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等類的書籍。「有時在下午，我會與朋友上山散步；傍晚則再度於餐館會面，花上八十芬

尼吃頓豐盛的晚餐。我讀羅宰（Rudolf Hermann Lotze）的《小宇宙》（*Mikrokosmos*），進而我們熱烈地討論它」。^⑨ 有些時候，教授邀請他到家裡玩，這讓韋伯有機會進行觀察，日後向他們這群朋友模仿他們所熟知的人物的特徵。

第二學期開始，韋伯熱心地加入決鬥兄弟會的社交生活，學習著在狂飲和鬥劍中不落下風。不久，他的臉上留下了[當時學生臉上]常見的傷疤。他開始欠債，而且在海德堡求學期間一直如此。他在這段期間學會的許多學生歌曲或愛國歌曲，一生都留在他的記憶裡。當年清瘦的青年，逐漸成熟為一個剛強、有著寬闊肩膀而相當壯實的成年人。當他去探望在柏林的母親時，他是一個具備了德意志帝國外在特徵的大男人；他的外表使他母親震驚，竟然在他臉上摑了一個巴掌。^⑩

回顧在海德堡度過的歲月，韋伯寫道：「決鬥兄弟會在桀傲不遜的侵略性方面的一般訓練，以及身為預備軍官，無疑地給予我相當深沈的影響。它一掃我在成長時期害羞與缺乏安全感的氣質」。^⑪

在海德堡讀了三個學期後，十九歲的韋伯前往斯特拉斯堡服役。由於除了鬥劍之外，他從未有過任何體力上的訓練，所以服役及軍事操練令他難以適應。而在體力緊張外，他更深為軍營訓練的無聊與下級長官的無理找碴所苦。他不願放棄在知性方面的興趣：

當我返家，通常約莫於九點上床睡覺。可是我無法入睡，因為我的眼睛並不感覺疲倦，而人裏面知性的一面，則尚沒有發揮功能。這種緩緩墮入麻木僵化的無底暗淵中的感覺，從早上開始，隨著一天的過去，益形增強；這實在是最不愉快的一件事。^⑫

韋伯不得不在晚上借酒澆愁，翌日則帶著相當的宿醉參加例行軍事訓練，來麻痺此一感覺。這時候，他覺得「時光在飛逝，因為腦際

不曾有一點思想的活動」。^⑬ 雖然後來他的耐力逐漸增強，相當成功地應付了大多數體能訓練的要求，可是始終他在體操方面顯得笨拙。有一次，一位士官用柏林的土語對他咆哮：「喂！你看來像一隻在槓子上擺臀盪腰的大酒桶」。^⑭ 為了彌補這項不足，他在行軍耐力與踢正步兩方面力求表現。他的內心無時無刻不在抗拒：

不知道有多少時間，都浪費在馴服能夠思想的人，把他們變成機器，對命令的服從像機器一般精確不苟。……叫一年役志願兵從事各種毫無意義的活動，這些活動是什麼呢？什麼也不是，只是用四十五分鐘或一個小時四處站著張望，這就是所謂的“軍事訓練”。據說這樣作目的在於培養耐性，天哪！好像說經過三個月每天多少小時的操槍教練，吞下最卑賤的惡棍數不清的侮辱之後，還有人有缺乏耐性的嫌疑！一年兵在服役期間不得有用腦筋的機會，這乃是一個原則……。^⑮

不過，韋伯十分客觀：他承認頭腦停止運作的時候，身體運作更為精確。當他得到軍官官階後，他很快便知道去看軍旅生活中比較愉快的一面。他頗受上級長官的器重，並且在與同儕的軍官們聚餐之際，吹誇一些荒謬不經的故事和顯露他敏銳的幽默感；更且，作為一位有統御能力的指揮官，他贏得屬下的尊敬。

1884年，他結束了軍旅生活。時年二十的韋伯，在柏林和哥丁根（Göttingen）重拾大學課業。兩年後，他在哥丁根參加第一次法學考試。但是1885年夏季和1887年，他兩度回到斯特拉斯堡接受軍事訓練。1888年他參與在波森（Posen）所舉行的軍事演習。在波森，他身歷其境地感受到了德意志和斯拉夫兩個世界間邊界的氣氛；對他而言，這似乎也是個“文化上的”邊陲地帶。在他寫給母親的一封信中，談到了禪窟（William Ellery Channing），可以表現他這段時期

的思想。

禪窟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過韋伯不願接受禪窟的倫理絕對主義及和平主義（pacifism）。「我就是看不出來，將職業軍人和殺人兇手視為一類，公然加以誣蔑，會導致任何道德上的提昇。戰爭絕不會因此而變得比較人道」。^⑩ 出於他的本色，韋伯並不從神學上去爭論“山上訓詞”（the Sermon on the Mount）；他找出禪窟的看法在社會與歷史方面所處的環境，由而與禪窟保持距離；他用這種方法來對禪窟的立場作了解，並且把它“相對化”。「禪窟對於（戰爭及逃兵）這類事情顯然毫無了解。他心裡面想到的軍隊的情況，是民主政體的美國聯邦政府對墨西哥等國進行掠奪性戰爭時所用的美式傭兵的狀況」。^⑪ 這些論點，具體而微地顯示了韋伯日後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最後一節、以及〈宗教上對世界的拒斥〉^⑫ 有關宗教和政治的討論中所採取的立場。

在斯特拉斯堡，韋伯主要的社交經驗仍然侷限在家族圈內；這可以說是他生活方式的特色。他母親有兩個姐姐都嫁給斯特拉斯堡的教授，韋伯在她們的家裡，享受到友誼、睿智的談話、以及深厚的感情經驗。鮑姆加騰家族中，有些人特別耽于神祕和宗教的經驗；年輕的韋伯，懷著深刻的同情，分享這些經驗所激發的緊張情緒。他學著去欣賞並且同情他們各自不同的價值，幾乎變成每一個有關的人的心腹。他稱自己為“見過世面的人”（*Ich Weltmensch*），努力地為捲入問題的人個別找到可行的解決方法。在韋伯而言，這樣做其實就是超越倫理上的絕對主義：「在我看來，如果我們不是一頭逕問（鮑姆加騰家的人往往如此，此刻也不例外）『在道德上誰是誰非？』，事情便不會如此嚴重。其實應該問的是：『面對已經存在的衝突，我要如何在對所有的人造成最小的外在內在傷害的情況下，解決這個衝突？』」^⑬ 韋伯這樣子提出來的觀點，是一種實際的觀點，把我們的注

意力的焦點，集中在各種決定的後果上，而不是一味堅持個人捫心求證自己強烈的誠意。他早年在斯特拉斯堡的書信和經驗，明白地預示了後來他在責任倫理和心志倫理之間所作的區分。

學業完成之後，韋伯在柏林的法院任職，與雙親住在一起。80年代早期，他追隨當代著名的法學家讀書，在他們的課堂上當一位用功的學生。在這些法學家中，葛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是他景仰的；此人的課導引他注意到當時的政治問題。「我發現他的講課是真正的傑作……他率直討論時下政治問題的方式、他不帶宣傳氣味而表達出來的強烈自由主義觀點，著實令我吃驚。崔采克在討論國家與教會的課上，就顯得是在作宣傳」。^⑭

韋伯把全部心力，放在一個經濟史和法律史重疊的領域上。他的博士論文（1889年）以中世紀的貿易公司史為主題，參考了數百件義大利及西班牙的資料；為此，他還學習這兩種語文。1890年，他通過第二階段的法律考試。1891年，他以一篇處理馬克思（Karl Marx）曾稱為“羅馬人的祕密歷史”的論文——《羅馬農業史》（*Die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在柏林取得商業法、日耳曼法和羅馬法的任教資格（*Habilitation*）。在這個平淡的標題之下，韋伯實際是從社會、經濟和文化幾個方面，分析古代社會；日後，韋伯曾經數度回來探討這個問題。在博士論文的口試中，韋伯必須要答覆莫姆森所提出來的某些問題。兩個人的討論沒有達成結論，但在討論結束時，這位傑出的歷史學家說，他還沒有遇到過比「這位得到極高評價的瑪克斯韋伯」更能繼承他的人。^⑮

1892年春，老韋伯的一位姪孫女，到柏林來接受專門職業教育。瑪麗安妮施尼特額（Marianne Schnitger）時年二十二，父親是位醫生；她曾在漢諾威市一所女子儀範學校（finishing school）進修。一年以前，她曾拜訪過韋伯的家。這次重返柏林，她察覺自己已與韋伯墮入情網。經過一陣迷惘混亂、一些維多利亞式的誤會、一番道德上的摸索自問，韋伯與瑪麗安妮終於宣布訂婚。他們在1893年秋天結婚。

在他娶瑪麗安妮為妻之前，大約六年之久，韋伯曾愛過斯特拉斯堡一位姨母的女兒。這位女孩曾在精神病院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韋伯溫婉地與她斷絕關係之際，她正在逐步地復原之中。他永遠沒有忘懷自己如何給這位纖弱的女孩帶來痛苦，雖然那並非他的本意。他之所以溫和對待那些在人際關係方面犯錯誤的人，以及在個人問題上採取斯多噶式的一般態度，這或許是一個重要的理由。除開此層關係外，他和瑪麗安妮的婚事，還曾受到另一項道德困境的困擾。或許因為韋伯遲遲不敢接近瑪麗安妮，他的一位朋友曾追求瑪麗安妮，以至於韋伯必須橫插進去。這對韋伯來說，也有幾分痛苦。

瑪麗安妮過門之後，韋伯在柏林過著年輕學者少年得志的生活。其時著名的經濟學教師葛施米德（Levin Goldschmidt）生病，他的職位遂由韋伯暫代。韋伯每星期得花十九個小時在講台與討論課上。他也參加了國家律師檢定考試；除此以外，他又給自己安排許多沈重的工作。他積極地為政府機構作諮詢工作，並且為民間改革團體進行特別研究，主題之一為證券交易所，另外一項研究是關於德國東部莊園。

1894年秋，他接受了福萊堡（Freiburg）大學經濟學正教授的教職。在該地他見到敏斯特堡（Hugo Münsterberg）、瑙曼（Friedrich Naumann）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由於工作繁重，他每

每挑燈至更深人靜。當瑪麗安妮勸他休息時，他總是大聲地說：「我若不工作到凌晨一點，就不可能算是一個教授」。^②

1895年，韋伯一家赴蘇格蘭及愛爾蘭西海岸一遊。回到福萊堡之後，他在大學發表他的就職演說，題目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其中他表白了對帝國“權力政治”和霍亨索倫王朝（The House of Hohenzollern）的信念。這篇演說引起相當大的騷動。他寫道：「我的觀點之殘酷，已引起驚恐。但是天主教徒最滿意，因為我給予“倫理文化”（ethical culture）狠狠一擊」。^③

1896年，韋伯接受了海德堡大學的一個講座席位，接替退休的著名學者、“歷史學派”（the historical school）領袖之一的克尼斯（Karl Knies）。也因此他成為許多昔日師長——諸如費舍（Kuno Fischer）、貝柯（Immanuel Bekker）和其他仍然對海德堡的思想和社交生活有決定影響的人——的同事。他的朋友包括耶里內克（Georg Jellinek）、韓策爾（Paul Hensel）、藝術史家諾依曼（Karl Neumann）和宗教學家托洛爾區（Ernst Troeltsch）。托洛爾區是韋伯最貼心的朋友和學術上的知己之一，曾在韋伯家住過一段日子。

四、

韋伯的父親死於1897年。去世前不久，父子倆曾經發生緊張的爭執，韋伯激烈地護衛母親，反抗在他認為是父親專擅的管制。後來，韋伯自覺他對父親所表現的敵意，是一項永遠無法彌補的罪行。^④ 那年夏季，韋伯夫婦遊西班牙。回程途中，韋伯發燒不退，精神亦覺不適。學期開始時，他似乎已有起色，但到秋季班快結束時，因著緊張、

自責、疲憊與焦慮，他終於倒了下來。由於他的病基本上是在精神方面，於是醫生指示他洗冷水浴、多旅行、多運動。可是，韋伯依然因為內在的緊張而飽受失眠的煎熬。

在以後的歲月裡，他斷斷續續地陷入嚴重的精神抑鬱狀況之中，夾雜著一陣一陣發狂一般的激烈學術工作和頻繁的旅行。事實上，從這時開始，他的生活方式似乎就在精神崩潰、旅遊和工作之間移動。憑著一份深沈的幽默感和凜然無懼地奉行蘇格拉底的格言，他支撐了下來。

一心想找出逆境的正面價值，也為了安慰妻子，韋伯這樣寫道：

這樣一種疾病卻也有它的補償。它將生命中人性的一面重新展現在我面前，而這正是母親已往在我身上找不到的。現在我對這一點的了解程度，是我以前從來想像不到的。我可以借用柏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的話說：「一隻冰冷的手使我得到解放」。^②過去數年，我病態的性情表現在我痙攣地抓住學術研究工作，好像這是一道護身符，但是我卻不曉得我要用學術工作祛除什麼東西。回顧既往，這已十分明白。以後，不管生病或康健，我知道我將再也不是從前那個樣子了。我已經不再有需要去感覺到自己被繁重的工作所壓倒。現在，我最大的希望，是過一種充滿人性的生活，並且盡我所能使我的寶貝快樂。我不認為這樣子一來，我的成就會比從前我心中的機械勞動所生產的少。當然，這都要看我的狀況，而要真正、永久地改善我的狀況，畢竟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很多的休息。^③

韋伯一再試著繼續他的教書事業。然而，在一次這樣的 effort 當中，他的雙臂和背部突然暫時麻痺，不過他仍勉強自己教完該學期的課程。他感到身心異常疲憊，頭腦覺得倦怠；每一次用腦筋的事，尤其是

講話，都讓他覺得元氣大傷。儘管他偶爾也會憤怒和不耐，但他把自己的狀況看成他命運的一部分。他拒絕所有的“好言相勸”。打從青年期以來，他的一切都是為著思考的生涯而準備的。但如今，每一項智識性的活動，都變成他的毒藥。他不曾培養起任何藝術方面的 ability，而任何一種體力活動，都令他覺得無趣。他的妻子勸他培養一種技藝或者嗜好，可是卻遭到他的嘲笑。有時他會坐上好幾個鐘頭，空茫地向前凝視，無意識地挖自己的指甲，自稱像這樣什麼事也不做，他才覺得舒服。當他想要看自己的演講稿時，那些字總是一團混亂地在他眼前浮游。有一天，他在樹林中漫步，居然失去控制，公然號啕大哭。家裡飼養的一隻貓的咪鳴聲，竟使他狂怒不可遏。這些病徵都是在1898及1899年間出現的。學校當局特准他全薪休假。韋伯在1908年給朋友佛茨勒（Karl Vossler）的一封信中寫道：「“逆境教人禱告”——一定如此嗎？就我個人經驗而言，我無法苟同。當然，我同意你的看法，情況經常是如此的——就人的尊嚴來說，經常得過了份」。^④

1899年秋天，韋伯夫婦到威尼斯（Venice）“度假”。回到海德堡之後，韋伯再度拾起一小部份教學工作，但不久又崩潰了，情況比已往都來得嚴重。耶誕節期間，他請求辭職，不過學校給了他更長的假期，薪水照發。「無論讀書、寫字、說話、走路、或睡覺，他沒有不感到痛楚的；他所有精神機能和部份軀體機能，都拒絕運作」。^⑤

1900年7月^⑥，他進入一所小型的精神病院，單獨在那裡住了幾個星期。韋伯一位年紀尚輕的表弟^⑦，也因精神異常被送到這家醫院。那年冬天，韋伯的妻子接受醫生的建議，陪伴這兩個人到科西嘉島（Corsica）的亞佳丘（Ajaccio）旅行。翌年春，他們到達羅馬；當地的古代廢墟，重新燃起韋伯歷史方面的興趣。然而身旁那位罹患精神病的年輕人，卻令他倍感沮喪。這位年輕人隨即被安排送回家去。數年之後，這個青年自殺了。韋伯給他雙親的弔唁信，使我們得以略

窺他在對自殺的態度上不落凡俗：

他[指他的這位表弟]被一具無法治癒的病體所束縛，然而，或許正因為他的病，他卻發展出一種敏銳的感情、一種對自我的清明、以及一種深深潛藏着的、驕傲而高貴的內在自我；即使在健康的人身上，我們也絕難見到這些。祇有那些像我們一樣，曾經與他十分接近，而又學著去愛他，同時對該病有親身體會的人，才有這種了解與判斷。
……他的未來既然已無法改變，他選擇這個時刻，在你們之前去到那個未知的世界，是對的。否則你們將不得不把他一個人留在世上，讓他無助而孤零地走下那黑暗的命運。^①

韋伯對自殺的這種評價，和近代斯多噶型的思想家如蒙田（Michel Montaigne）、休姆（David Hume）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一致，認為自殺乃是一種對個人自由所做的最後而頑固的肯定。不過，他同時也認為救世宗教不認可“自願的死”（voluntary death），僅有哲學家才把它神聖化。^②

在義大利的壯麗景色及歷史偉蹟的影響之下，韋伯徐緩地康復。韋伯夫婦也在瑞士待過一段時間，他五十七歲的母親和弟弟阿爾弗烈德（Alfred Weber）曾來探望他們。母親來到後不久，韋伯開始能夠看書，看的是一本有關藝術史的書籍。他說：「天曉得這種情況我能維持多久？除了我本行以外的任何書都成」。經過三年半斷斷續續的病痛折磨，1902年，韋伯自覺可以重返海德堡，做一些輕鬆的工作。慢慢地，他也開始閱讀專業期刊，以及像齊默（Georg Simmel）《錢的哲學》（*Philosophie des Geldes*）一類的書。隨後，彷彿為了補償數年來他在智識上的闕如，他投入一片無所不包的浩瀚文獻書籍中，包括藝術史、經濟學、政治學，外加修道院的經濟史。

不過，他也曾數度遭遇挫折。他仍然無法完全恢復教書的工作。他要求學校解除他正教授的職務，改聘為有名無實的名義教授。此一請求最初被否決，然而經他再三堅持，終於被改聘為講師。他曾請求擔任博士候選人的主考官，但未獲准。過去四年半，他沒有出版過任何東西，現在他寫出了一篇書評。一個嶄新的著作階段終於開始了，他首先探討的，是社會科學的方法問題。

韋伯生病期間，學校給他的薪水照發；拿了錢，卻沒有做足夠的工作，這點給他造成很大的心理負擔，耿耿於懷。他認為，祇有工作中的人，才算是一個完全的人（a full man）；於是強迫自己工作。然而，僅過了一個夏季，他又單獨重返義大利。1903年一年中，他離開德國出外旅行不下六次，其間到過義大利、荷蘭和比利時。偶爾，他會因自己的精神狀況、對自己能力不足的失望、與海德堡教授團的摩擦、以及祖國的政治情況，而興起永遠不再返回德國的念頭。不過，就在1903這一年，他開始與宋巴特（Werner Sombart）參與《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③的編輯工作；該刊物在遭納粹停刊以前，可能是德國執牛耳的社會科學期刊。這個編輯工作，使韋伯有機會再度與眾多學者和政治圈內人物聯繫，並且擴大了他自身工作的興趣焦點。迨至1904年，他的寫作工作恢復正常，而且數量扶搖直上。他發表的文章主題包括普魯士貴族莊園（Junker estates）的社會及經濟問題、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以及《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的第一部分。

敏斯特堡這位韋伯在福萊堡大學時代的同事，1904年幫忙籌組“人文學科及自然科學會議”（Congress of Arts and Sciences），作為在美國聖路易（St. Louis）舉行的萬國博覽會節目系列的一部分。他邀請韋伯在會議上宣讀一篇論文（同時被邀的還有宋巴特、托洛爾

區和其他許多人）。是年8月，韋伯偕妻子首途前往美國。

五、

美國讓韋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是他仍然保持冷靜旁觀的態度。他充份擁有吉朋（Edward Gibbon）用來形容用心在國外遊歷的人所具備的“美德”，亦即一種「近乎惡的美德」；開放的性格，使他怡然溶入從宮廷到茅舍的各種圈子；心境的順暢交匯，讓他無論處在哪一群人、在哪一種情況下，皆能自娛娛人」。^② 因此，韋伯對那些很快產生偏見的同僚，感到不耐及憤怒；他們在紐約停留一天半後，即開始醜詬美國的事物。

韋伯希望能懷著同情的心來了解這個新大陸，而同時卻不放棄日後作周延判斷的能力。他喜歡在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中央，觀覽曼哈坦下城尖峰時刻的景象；川流不息的車輛和喧囂，交織成一幅萬象畫面；這一切使他著迷。至於他視作“資本之堡壘”（fortresses of capital）的摩天大樓，則令他想起「舊圖片上面波隆那（Bologna）和佛羅倫斯（Florence）的那些高塔」。^③ 他拿這些資本主義高聳入雲的龐然巨物，與美國大學教授狹小的住宅，作了一個對比：

在這堆龐然巨物之間，不論居住或飲食，任何個人主義的欲望都是一件昂貴的東西。哥倫比亞大學德文系教授赫維（W. A. Hervey）的住宅，不折不扣是一棟娃娃屋。房間都很小，盥洗設備和廁所在同一個房間裏（大多數情形都是如此），不可能舉行超過四個來賓的宴會（這倒值得羨慕），除此之外，進城的車程需時一個小時……。^④

一行人結束在紐約的訪問後，前往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遊覽。他們參觀了一個小鎮，而後轉往芝加哥。韋伯對芝加哥的觀感是“不可思議”。他注意到它的治安混亂，暴力充斥，湖濱高級住宅區與貧民窟的天壤之別，牲畜屠宰場內「臭氣沖天，骯髒不潔，血汙滿地，毛皮四散」的景況，以及“令人瘋狂”的人種大混合：

希臘人以五分錢的代價替美國佬（Yankees）擦鞋，德國人充當他的侍者，愛爾蘭人替他管理政治，而義大利人則為他挖臭水溝。除了少數高級住宅區外，偌大一座比倫敦更大的巨城，就像一個剝了皮的人，它的五臟內躺在大家眼前運轉。^⑤

美國資本主義下浪費的程度，尤其是對生命的浪費，一次又一次給韋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注意到當時那些專門揭發社會腐化面的人正大肆宣揚的同樣情形。在寫給母親的一封信中，他如此說：

一天工作之後，工人時常要花幾個小時才能抵家。電車公司破產已有數年。按照通例，業務由債權人的律師接管。他並不急于清算帳目；在此情形下，他不會採購新的電車。舊車動輒故障，每年約有四百個人因此喪生或殘廢。根據法律，公司須賠償每位死者遺孀或子嗣約五千美元，殘廢事件須付給受害者本人一萬元。只要公司未採取某些預防措施，它就得付這些賠償。但是公司已經計算過，每年四百件意外事件的賠償費，總數較採取必要預防措施所花費的為少，因此公司就不肯採取這些預防措施。^⑥

在聖路易，韋伯以德國社會結構為題，發表演說，特別把重點放在農村和政治問題上，結果非常成功。這是他六年半以來的首次“演

講”。他的許多同僚都出席了此一集會，並且據當時也在場的他的妻子說，這次演講頗獲好評。韋伯夫婦為此欣喜異常，因為這似乎意味著他又能從事他本行的工作了。他們一路旅行，越過俄克拉荷馬州，到過紐奧良和塔斯凱奇學院（the Tuskegee Institution）^⑩；也拜望了在北卡羅萊納州和維吉尼亞州的遠房親戚；然後，很快地到費城、華府、巴的摩爾和波斯頓一遊。在紐約，為了撰寫《新教倫理》，他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找資料。

在〔我們所遇到的〕美國人中間，有一位婦人^⑪，擔任工業督察員的工作，是最了不起的人物。從這位熱情洋溢的社會主義者，你可以獲知許多這個世界最罪惡的事。在各州分權的制度下，社會立法完全無法進行；許多勞工領袖貪污腐化，先鼓動罷工，然後迫使製造業者賄賂他們來擺平工人的罷工。（我有一封介紹信，讓我去拜訪一個這樣的惡棍）……不過，〔美國人〕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祇有黑人問題和驚人的外來移民問題，形成一片巨大的烏雲。^⑫

美國旅遊期間，韋伯似乎對勞工問題、外來移民問題和政治管理——特別是地方自治政府——一切“資本主義精神”的表現、印地安人及其行政管理的問題、南方的惡劣情勢以及黑人問題，特別感興趣。談到美國的黑人，韋伯這樣寫著：「我曾與一百名左右的屬於社會各階層和政黨的南方白人談過，這些人（黑人）未來的境遇似乎是絕然無望」。^⑬

他在1904年9月到達美國，耶誕節前不久離開，返回德國。

美國對韋伯而言，或許就像英國之於前幾代的德國自由主義者一樣，都代表一個新社會的模型。美國的新教教派得到充分的發展機會，造成俗世性的、公民性的和“志願團體”的蓬勃滋長。在這裡，由

各州組成的政治聯邦，在“自願”的基礎上，融合各種巨大的差異於一爐。

韋伯絕不像那些德國公務人員一般妄自尊大，一方面以他們的“清廉政府”為傲，同時還輕蔑地指出美國政治的“藏汙納垢”。卡普這位歸國定居的德裔美國人，讓韋伯深切地了解這種態度。但是韋伯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事情。他相信政治不能只當作一件道德事業來判斷；他的態度與1830年代的希爾斯菲德（Charles Sealsfield）倒有幾分近似。當時，希爾斯菲德用史詩般的萬象景觀來呈現一個建立帝國的民族的誕生；這個國家註定要「躋身於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列」。希爾斯菲德問道：「我們的自由的一個必要、絕對的條件，難道不是任由公民的美德與惡行，因為它們被允許自由滋長，而滋長得更繁茂嗎？」經過親眼目睹，韋伯大有可能同意：「吸人密西西比河和紅河沼澤地散發的臭氣的嘴吧，不適於咀嚼葡萄乾；而能砍倒巨樹，把沼澤墾成良田的手，無法戴小孩的手套。我們的國家，是一塊充滿對比的土地」。^⑭

韋伯在美國的經歷，主要焦點放在官僚制度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發現，除非我們要的是一種“沒有領袖的民主”^⑮和百議紛紜的混亂狀況，近代“大眾民主”不能缺少“機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可是所謂“機器政治”，就是讓專業人員、讓紀律嚴明的黨組織和它有效率的宣傳，來經營政治。這樣的民主，也可能導致凱撒式的護民官掌權^⑯，不論它是以強人型的總統或市長姿態出現。這種過程的運作，在傾向上所取的方向，是日增的合於理性的效率，以及各種官僚機器：政黨的、市政的和聯邦的。

不過，韋伯是從一個辯證的角度，來看此一“建構機器”（machine-building）的過程：民主政府必須反對官僚體制，以後者傾向於形成一個官吏的排外世襲社會階級，那裡面的人的專業訓練、考試證

書和確保衣食無虞的終身職，使他們遠離一般民眾。但是，行政功能包羅的範圍日廣，國土已沒有新的邊疆可以開發，機會也逐漸減少，使得浪費公帑、行事違法、以及缺乏專業效能的政黨獵官制度（spoils system）^④，愈來愈不可行，也愈來愈不民主。因此，民主必須要助長理性所要求、但為民主情緒所憎恨的事物。在他的著作裡，韋伯屢次提到美國工人反對公務員制度改革；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他們寧可要一批他們可以趕下台、可以鄙視的腐敗政客，而不願受一批蔑視他們並且趕不走的專家官吏的治理。在強化德國總統權力、以制衡帝國議會（Reichstag）這件事上，韋伯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們應該把這件事和他在美國的體驗放在一起來看。在自由的社團裡，個人必須在平等的同儕面前證明自己的能力；這種社團裡，沒有權威的指揮，而是靠自主的決定、良好的判斷和負責任的言行來培養訓練出公民；[韋伯在美國的經驗中]，最令韋伯動容的，是這種社團所培育出來的一種人的高貴有力的能力。

1918年，韋伯在一封信中向一位同僚建議，德國應該以美國的“俱樂部型態”（club pattern）為借鏡，作為“再教育”德國人的一種方式。他寫道：因為「除了在教會形式下出現之外，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現在已完全失敗」。^⑤ 韋伯看出了“志願社團”與自由人的人格結構間的關連。他對新教教派所做的研究，也印證此一層關係。他深信，和權威性制度下命令與禁制的方法比起來，一套使個人始終受到壓力必須去證明自己的自動淘汰人的方式，就“鍛練”人這個目的而言，效果要深得太多。權威主義徒具外在約束力量，卻無法達到個人內心深處，一旦權威主義的外殼被相反的力量擊破，當事人便完全沒有能力自制自主。

六、

韋伯返回德國後，在海德堡重新開始他的寫作工作。他完成《基督新教倫理》的第二部分，在寫給里克特的一封信內稱之為：「新教的禁慾主義作為近代志業文明（vocational civilization, *Berufskultur*）的基石——一種對近代經濟的“精神論的”（spiritualist）建構」。^⑥

第一次俄國革命^⑦，使他的學術工作有了新的方向；每天起床前，他在床上讀俄文，為的是從俄國報紙上知道事情的最新發展。然後「像寫日誌一樣，用筆將它們記下來」。1906年，他發表了兩篇論述俄國的論文，一篇為〈俄國中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狀況〉（*Zur Lage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in Russland*），另一篇為〈論俄國向虛偽的立憲制的轉變〉（*Russlands Übergang zum 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

著名社會科學家如史摩勒（Gustav von Schmoller）、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都曾鼓勵他再任教授之職，但韋伯自覺無力勝任。有一大段時期，他一心只想好好寫作。可是，受到普遍推崇的他，總不免介入學院政治；他在學術界甄選新人時擔任評審工作，或是試圖為若干後進的年輕學者如齊默、米赫爾斯（Robert Michels）找尋機會；這批人或是因為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或是因為眾人對信奉社會主義的青年講師存有偏見，以致阻絕或妨礙了他們在事業上的發展。米赫爾斯的案子，特別令韋伯憤怒。米赫爾斯是科隆（Cologne）一個古老顯赫的商人家族出身，因為他是社會民主黨，當時德國大學都不肯用他。韋伯指出：「我若將我們這種情形，與義大利、法國、甚至目前俄國的情況相互比較，我不得不認為它是一個文明國家的恥辱」。^⑧ 對於排斥米赫爾斯，某位教授指出，除了政治

理由外，還有一個原因是：米赫爾斯沒有讓他小孩受洗。韋伯針對此一問題，在《法蘭克福時報》（*Frankfurter Zeitung*）寫了一篇署題〈所謂學術自由〉（*Die Sogenannte "Lehrfreiheit"*）的文章，其中他說道：

祇要這種觀念佔優勢，我看不出我們可以佯裝有所謂學術自由這樣一件東西。……並且，祇要宗教社群寬容並且公開允許聖禮儀式被人用來作為拓展事業的手段，像鬥劍社團（dueling corps）或軍官的委任一樣，那麼它們理該受到已往它們常常抱怨的世人的輕蔑和鄙視。^⑤

1908年，韋伯在西發里亞（Westphalia）祖父的亞麻工廠進行工業心理方面的調查研究。他的希望是能發起一系列這類的研究；他有關方法論的筆記，即是就影響工業勞工生產力的生理和心理因素所作的因果分析。同年，他寫出一篇論述古代社會之社會結構的長篇論文，發表在一本百科全書上，標題平實但易生誤解——《古代農業制度》（*Agrarverhältnisse in Altertum*）。

1909年，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一位弟子，^⑥ 在海德堡的知識圈子裡出現。他以一套新的心理健康的生活規範為名，貶斥傳統維多利亞式的想法中夫妻間的忠實及在道德上合理的嫉妒。韋伯的友人中間，有人因為把這套說法付諸實行，陷入了悲劇性的糾纏和道德上的難局中。韋伯對他們充滿了同情。在他看來，精神醫學上有價值但仍不精確的一些慧見，和一套庸俗地以“健康的神經”為尚的倫理，混淆在一起了；對於這種混淆，韋伯的反應很強烈。他不願意把健康的神經當成一種絕對的價值，也不願意以壓抑對神經造成的傷害為單位，來計算壓抑有多少道德上的價值。韋伯認為佛洛依德的治療方法，只是新裝之下的舊日告解式（confession），不過臨床醫師取

代了昔日的精神導師。他覺得，在精神病醫師的科學性討論的外表底下，隱藏了一套倫理；而就這一點來說，應該只管手段的專業科學家，實際上卻在篡奪普通人自己作價值判斷的權利。韋伯因此相信，在一套他覺得並沒有基礎的臨床理論的外表包裝之下，實際上是一套“放蕩”的生活方式。我們很容易看出，韋伯不能接受這樣的一套理論，因為這套理論在原則上便攻擊禁慾主義，只從實用角度來決定目的，而解除了英雄倫理（heroic ethic）對個人的要求。韋伯本人的良知極端地嚴肅，他常常以寬容的心去原諒別人，但對自己的要求卻十分嚴格。他相信，許多追隨佛洛依德的人，一心不過是想替在他看來不過是道德淪喪的行為找理由罷了。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到，韋伯雖然不願意見到佛洛依德的弟子們，以這種牽涉到個人的方式，來應用他們的理論，但對他來說，

毫無疑問，在我們解釋文化史——特別是宗教史、習俗及風尚的歷史——中的許多現象時，佛洛依德的觀念可以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源頭——雖然，從一個文化史學者的角度來看，這套觀念的意義，絕對沒有普遍到佛洛依德和他的弟子們在興奮和歡喜於有所發現之際——這是完全可以了解的——所設想的那個程度。先決條件，是去建立起一套精密的決疑術（casuistry）^⑦，其幅度之廣和確定程度之高，在今天並不存在——儘管有人說已經實現了——但在未來二、三十年間，或可得見。^⑧

從1906年到1910年在海德堡的這段歲月裡，韋伯常與一些傑出的同僚，如他的弟弟阿爾弗烈德韋伯、克雷伯斯（Otto Klebs）、葛特漢（Eberhard Gothein）、溫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耶里內克、托洛爾區、諾依曼、拉斯克（Emil Lask）、龐朵夫（Friedri-

ch Gundolf) 和薩爾茲 (Arthur Salz) 等人，進行激烈的學術性討論。每逢假期或其他空閒時期，許多朋友從外地到海德堡來拜望韋伯一家人。其中有米赫爾斯、宋巴特、哲學家韓策爾、敏斯特堡、佟尼思 (Ferdinand Tönnies)、佛茨勒、以及最重要的齊默。年輕學者來尋求韋伯熏陶的，有杭尼克斯漢 (Paul Honigsheim)、略文斯坦 (Karl Löwenstein) 和盧卡奇 (Georg Lukács)。這些圈子中，也包括非學術界的人士，其中有幾位傑出的藝術家，如音樂家托伯勒 (Mina Tobler) (韋伯研究印度教與佛教的著作，便是獻給此人的)、退休女伶施密隆寶 (Kläre Schmid-Romberg) 和她的身為詩人、哲學家兼藝術鑑賞家的丈夫。雅士培 (Karl Jaspers) 是一位精神病學者，後來轉為哲學家，利用祁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 的作品建立他的存在主義哲學 (Existentialism)；戈魯里 (Hans Gruhle)，是一位對最新的現代藝術有濃厚興趣的精神病學家；他們兩人也屬於這個圈子。在海德堡這些聚會中，思想界和藝術界三代精英共聚一堂，進行活躍的討論溝通。

1908年，韋伯積極地為社會政策學會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的計畫工作。^④ 他秉持著尚公無私的態度，不畏煩難地設法克服這類組織常見的困難。學會的會議中討論的水平之決定、未來工作的範圍之規劃，都是以他為主促成。他鼓勵從事集體研究計畫，例如一項從運動聯盟到宗教派系與政黨等志願社團的調查研究。他提議以問卷方式對新聞界做一次有系統的研究，並且指導、推動工業心理學的研究。在此之外，他負責替出版家齊貝克 (Paul Siebeck) 編纂一系列包括各種主題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叢書。這個計畫本擬以二年為期，但事實上在他死後仍然賡續未停；他自己那本逝世後才出版的《經濟與社會》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即為此系列叢書中的一冊。

韋伯的榮譽感極為嚴格。他的騎士精神，遇事即有不容躊躇的反

應；這些，再加上他具有後備軍人的身分，使他在某些情況下，必須要涉入法律訴訟和“名譽事件”。個性使然，韋伯處事每每發之於衝動和義憤。但是，一旦他所發動的力量在道德上擊潰了對手，他的憤怒會平息，內心充滿著慈悲和同情；而若他意識到，在有過的人之外的其他人，為他的行動所累，他的反應更是如此。對這類事情的感覺不若韋伯之強烈的親近朋友們，會認為他吹毛求疵、缺乏輕重節制，就像一個大有可能因自己的行動惹來麻煩的唐吉訶德。也有人推他為德國的一代師表，憑他的道德權威，他超越了那些一心求昇遷騰達的庸懦俗人。韋伯的唐吉訶德面，在他於1917年對他的朋友霍依斯 (Theodor Heuss) 所說的一段話中，表現得很清楚：「一旦戰爭結束，我將羞辱德皇，直到他控告我，到那時，那批該負責任的政治家畢洛 (Bernhard von Bülow)，提比茲 (Alfred von Tirpitz) 和貝特曼豪威克 (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將被迫在法庭上宣誓後作證」。^⑤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韋伯年五十。「戰爭誠然恐怖醜惡，但這是一場偉大而奇妙的戰爭」。^⑥ 他想要帶領士卒上戰場，可是因年紀加上身體情況無法如願，令他很難過。不過，由於他是後備軍官，他被任命為職掌紀律兼軍需的軍官，官拜上尉，負責設立並管理海德堡地區的九所醫院。在這個職位上，他從內部親身體驗到了官僚制度 (bureaucracy) ——這是他社會學的中心概念之一。不過，他所掌管的這套社會機構，是一種由素人 (dilettantes) 而非專業人才構成的機構；韋伯努力將它轉化為一個有秩序的官僚組織，並目睹此項轉變。他的職位從1914年8月持續到1915年秋，隨後在一次改組中被裁撤，韋伯光榮離職。至於戰時他在政治上的挫敗，我們稍後就要討論。

為了與亞飛 (Edgar Jaffe) 磋商有關比利時佔領區的行政管理事

宜，他到布魯塞爾（Brussels）短期停留一陣子。^⑧之後，他赴柏林，以預言災難的人自居，撰寫備忘錄，與政治當局接觸，並且對帝國主義者的野心鬥爭。歸根究底，他揭發了主戰派的行徑其實是軍火販子與農業資本家的一場賭博。接著他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從柏林到維也納和布達佩斯，與工業家就關稅問題進行非官式的磋商。

到了1916年秋，韋伯已經回到海德堡，研究希伯萊先知，並且繼續撰寫《經濟與社會》的若干章節。1917年夏，他赴西發里亞他妻子的故鄉度假，其間閱讀蓋歐克（Stefan George）的詩集和龔朵夫討論歌德的書。1917及1918年冬在海德堡，一些主張社會主義與反戰的學生，時常於星期日到他家參加例行的公開討論會。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托勒（Ernst Toller），也是其中之一，時常朗誦他的詩。後來，當托勒被捕時，韋伯在軍事法庭上極力為他辯護，最後使他獲釋，然而韋伯卻無法阻止大學開除這些學生。

1918年4月，韋伯前往維也納，在維也納大學講一個學期的課。這是他十九年來首次在大學開課。他以“對唯物史觀的正面批判”（A Positive Critique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為題，提出了他關於世界宗教及政治的社會學。^⑨他的課在大學裡轟動一時，教授、政府官員、和政界人士都前來聽講，故而他不得不在最大的講堂上課。可是，為了教這門課，他又被無法遏抑的焦慮所困，得服用鎮靜劑，才能入睡。維也納大學有意給他一個終身職位，他卻沒有接受。

1918年，韋伯從君主派變成共和派的擁護者。正如邁耐克（Friedrich Meinecke）所言：「我們從發自感情的保皇派，轉變成發自理性的共和派」。他不願在新政權內接受任何政治職位；柏林、哥丁根、波昂和慕尼黑各大學都表示願意聘請他。他接受了慕尼黑大學之聘，1919年夏天接替布倫塔諾的位子。在慕尼黑，他經歷巴伐利亞（

Bavaria）專政及其崩潰所引發的風暴。他的最後一門課是應學生之請而講，其內容後來成書出版為《經濟通史》（*Wirtschaftsgeschichte*）。仲夏，他病倒了，在病況已入末期時，醫生始診斷出他得的是已入膏肓的肺炎。1920年6月14日，韋伯離開人世。

七、

韋伯是屬於通才（universal scholar）的一代，他所表現的學術風貌，有其明確的社會學的條件。條件之一是人文中學（gymnasium）的教育。以韋伯為例，經過這種教育的培養之後，印歐語系的各種語言，都不過是同一套語言工具中的各種方言罷了。希伯萊文和俄文的閱讀能力，是他順帶培養出來的。家庭背景在知性上的誘導，使他最早起步，而且也使他能夠學習多種不常集於一人之身的科目。當他通過法律考試的時候，他已經是一位訓練紮實的經濟學家、史學家和哲學家了。透過斯特拉斯堡親戚的關係，他曾參與當時的神學爭論，這使他對神學文獻相當熟悉，能夠熟練地使用它們。

顯然，若沒有某種充分的餘裕，韋伯是無法完成數量龐巨的作品的。在物質方面，首先，以他在德國大學任職的學者地位，才有此可能。這種德國式的安排，使德國大學的“私講師”（docent）有時間從事研究工作，而處在同一階段的美國年輕大學教員，卻必須負荷沈重的教學工作。除此之外，德國也沒有急於出版著作的壓力；《經濟與社會》一書中許多長度像書一樣的篇章，雖寫於一次大戰前，卻直到1920年後才出版，即為明證。韋伯在中年時期，曾繼承一筆為數充裕的財產，這使他不虞金錢的匱乏。

既然對比之下，比較不見要求知識必須“實際”和立即“可用”

的壓力，再加上濃烈的人文主義氣氛的襯托，學者遂得鑽研與當下的實際需要無甚關係的題目。在社會科學裡面，情形更是如此，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的衝擊之下，學者必須研究的問題不是狹隘的、“實際”的題目，而是把資本主義當成一個橫亘一整個歷史時代的結構來探討。在這方面，大學不受地方壓力的干擾，是很重要的。

從1870到1914年，德國享受了長時期的和平，加上社會普遍繁榮，全然改變了德國的學術環境。為五斗米折腰的小資產階級教授們，如今全為一批擁有巨大宅第和女僕的上層階級學院派教授所取代。此一轉變，促成了學術性沙龍的出現。韋伯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大學教授的住宅的。

德國的思想傳統和積累下來的學術，特別是在史學、古典文學、心理學、神學、比較文學、語言學和哲學方面，使十九世紀晚期的德國學者，站在一個優越的基礎上，來展開他的工作。當時，一方面有黑格爾（G. W. F. Hegel）和蘭克（Leopold von Ranke）傳統下的學院派學者，對理念做保守性的詮釋；另一方面，則有非學院的社會主義者考茨基（Karl Kautsky）、柏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梅林（Franz Mehring），從事激進的學術研究；這兩派學術工作的衝突，構成一種獨特而富挑戰性的思想學術上的緊張關係。

有好幾項矛盾的因素，在緊張的狀態中對峙，韋伯的一生和學術見解，是由它們所構成的。如果像他自己所說：「人不是一本打開的書」，我們自然不應期望他的多面生活，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指標來貫穿說明。要了解他，我們必須對一系列非理性而近乎弔詭的矛盾有所掌握。

韋伯個人雖然沒有宗教信仰——一套句他的話說：「欠缺宗教共鳴」（religiously unmusical）——可是他卻花費了許多學術上的精力，探索宗教對人類行為和生活的影響。就這方面而言，在此再次指出，他

的母親和她的家族，有強烈的宗教敬虔，以及韋伯在早期學生時代，曾與經歷過不尋常的宗教和心靈狀態的朋友及親戚親密相處，或許並非毫不相關；這些經驗，深深鐫刻在他的心裡。不消說，他藐視一般傳統的“教會”式的基督教，不過對於因為政治悲劇或個人絕望而犧牲自己的理知、遁入宗教祭壇尋求慰藉的人，他表現出憐憫與寬宏。

在韋伯的許多朋友看來，韋伯對於工作嚴肅的奉獻、舉止儀態中明顯的情操與尊嚴、以及他的言談所具有的力量與洞見，都是表現出宗教傾向的現象。但是，若我們沒有領會到他對宗教問題的看法是如何地清醒實際（disenchanted），我們便幾乎無法了解他的思想。韋伯對母親的感情，以及發自內心與宗教疏離的態度，使他永遠不會像尼采那般，對神發出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式的褻瀆。尼采這位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無神論者，在韋伯看來，最終乃是「布爾喬亞庸俗主義難堪的殘留物」而已。^①

韋伯屬於最後一代的“政治教授”（political professor），這種教授，在對學術做出超然的貢獻之餘，身為中產階級思想上的前鋒，同時還是政治上的領導人物。儘管如此，為了學術的“客觀性”以及學生的自主，韋伯反對“崔采克們”，因為他們以隱閉的學術講堂，作為政治宣傳的論壇。韋伯雖然殷切關懷德國政策的動向，但理論上，他把他的教授與學者的角色，與政治評論家的角色，作了嚴格的劃分。不過，當他的朋友布倫塔諾在慕尼黑勸他接受一個職位時，他答覆說，如果他要接受任何學校的聘約，「我必須問，如果目前在柏林有一個持有我這種看法的人，來對抗該處瀰漫的徹底機會主義，豈不是更好？」^②

終其一生，韋伯是個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他期望他的民族能夠成為一個主人民族（Herrenvolk）；不過，他同時也為個人自由而戰；他並且以分析性的超然態度，指出民族主義（nationalism）

和種族主義（racism）的觀念，都是作為合理化工具的意識型態，由統治階級及他們所僱的政治評論家所用，以把他們的控制和安排，灌輸給社會中處境較弱的成員。韋伯極為讚揚德國崩潰期間勞工領袖實事求是的行為，然而他又痛責這同一批人藉著教條上的演練以收服群眾，訓練群眾去相信革命將會帶來一個天堂。他以身為普魯士軍官為榮，可是卻又公然宣稱，他的最高統帥德皇，所有的德國人都應引以為恥。他雖然是普魯士軍官和一個決鬥社團的成員，但他並不介意下榻的布魯塞爾旅館上空，飄揚著一面鮮紅的共產國際旗幟。雖然他是德意志帝國自覺的男性氣概的典型，不過他卻依然鼓勵起用第一位婦女勞工官員，並且對二十世紀初婦女解放運動的成員，發表重要的演說。

韋伯似乎是一位卓越的大學老師，但是幾乎有二十年時間，他的健康狀況不容許他授課。他雖然是一位學者，置身於大學講座上卻覺得不安，只有在政治講壇上才真正得其所。由於堅持精確和持平，他的文章通篇充滿了[目的在於補充、說明、或限定的]子句與條件，極其學究與艱澀之能事。可是，有時他會感到自己好比古代猶太（Judea）的群眾領袖（demagogues），向著街道上的熙攘群眾大聲疾呼。

與韋伯接觸過的人，對韋伯褒貶不一。在海德堡，許多同僚認為他是一個難以相處的人；由於他良心的要求甚嚴，又講求榮譽方面的一絲不苟，他是一個會攬局的麻煩人。或許有人認為他總是臆想自己有病。然而，在許多朋友與弟子的眼裡，他的才學仰之彌高巍然聳立。一位維也納的新聞記者，用這樣的老套字句來形容他：

高大而且滿臉絡腮鬍子，這位學者看似一位文藝復興時代的德國石匠；不過他的兩眼缺少藝術家那素樸天真與感官性的愉悦。他的凝視來自內心的最深處，發自隱僻的通道，投向最遙遠的地方。他的談

吐與外表相稱，無比地稜角分明。在這方面，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近乎古希臘的看事情的方式。他的用詞造字簡潔，在它們寧靜的簡單之中，我們想起碩大無朋不曾修飾的石塊。^②

一位在慕尼黑的弟子，個人與韋伯並不接近，只是遠遠地崇拜著他。這位學生將他比作杜瑞（Albrecht Dürer）所雕刻的武士：無懼無好，在死亡與魔鬼之間勇往直前。^③ 雅士培則把他看作一種新型的人，能夠不必訴諸幻想，而將自身內部極度的緊張、以及外在生活的諸般矛盾，綜合在一個統一的狀態中，保持精神上的寧靜。韋伯「浪費在政治事務上」而不是用來「使自己更超然」的每一天，在雅士培看來，都是令人惋惜的損失。^④

韋伯著作的讀者，可以強烈地感覺到其中瀰漫著一種旨在保持客觀性的悲情；但是儘管有這種客觀性，這些著作中的某些段落，仍然含有韋伯在自己眼中的形象。最明顯的段落，見諸他對某些希伯萊先知的描述。^⑤ 當戰爭的過程和德國的潰敗正如韋伯二十年來所預期的發生了，而德國人要為戰爭所帶來的一切災禍，單獨承挑所有的罪名，韋伯覺得德國民族成了賤民（a pariah people）。^⑥ 1916和1917年，在研究古代猶太教（Judaism）的過程中，他發現古代猶太人和現代德國人的處境頗相類似，不禁深自喟然。他覺得相類的，不僅是客觀的（public）和歷史的處境；在許多先知——特別是耶利米（Jeremiah）——的人格中、在他們不穩定與無法克制的心理狀態上，韋伯看到了許多與他自己相像的特質。

這種方式，對於從孩提時代起就無法直接表露自己的韋伯來說，或許是表達他的自我形象的唯一方式。因此，當他在作品中把對象化為客觀的存在時，他個人最深藏的一面既獲得顯現、同時也被隱藏起來。他對預言災難與毀滅的先知作詮釋，由而他在內心及世間的經驗

也得到了說明。

韋伯這種把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溶入歷史人物的作法，承襲的乃是十九世紀特有的一股廣闊的人文主義、歷史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傳統。十九世紀的傑出知識份子甚至政治家，常常利用歷史人物的裝束，來塑造自己的形象。拿破崙模仿亞歷山大大帝；大動亂時代的革命共和派，則透過普魯塔克（Plutarch）的《名人傳》來看自己。在德國，這種取徑幻覺的傾向，在整個自由主義時代仍甚盛行。某些德國最優秀的青年如黎柏爾（Francis Lieber），曾離開祖國去幫助希臘人從土耳其的統治下解放。可是巴爾幹山區窮鄙的馬販子，粉碎了古希臘大理石般純潔高貴的形象。個人的生活，取這種幻覺中的歷史感為背景。對無力的德國教授們來說，在思考宇宙性的觀念之餘，庸俗的氣氛嚴密地限制住了規律的日常生活，其平庸陳腐，或唯有賴這種歷史感，才能獲得補償。

倘使年齡漸長的韋伯，在人文主義的幻覺傳統之下，把自己與耶利米認同，他依然非常清楚，自己其實不是什麼先知。當一群景仰他的年輕知識份子力促他說明他的信念時，他拒絕了他們的請求，指出這種表白，是屬於親密朋儕圈內的事，而非屬於在公眾間為之的事。唯有先知、藝術家和聖者，能夠向公眾表露他們的靈魂。在韋伯眼裡，現代社會是沒有神的（godless），尤其沒有先知和聖者的立足之地。他僅提出以賽亞（Isaiah）的建議：「有人從西珥不住的問我：守望的啊！黑夜還有多久才過去呢？守望的啊！黑夜還有多久才過去呢？守望的人回答說：黎明來到了，可是黑夜卻還沒有過去！你們如果再想問些什麼，回頭再來吧！」^①

八、

如果我們要對韋伯的生平有一整體的了解，我們的探討必須及於他內心的緊張，和一再出現的精神不安。可以提出的解釋有好幾種；在這些解釋之間，我們可以找到一種說明。

韋伯可能因為遺傳而在體質上就有問題；毫無疑問地，這種體質上的問題，散見於他的家族中。這個解釋是最簡單的一種，其證據非常容易找到。韋伯的妻子是他的遠房親戚，她的一些男性親戚是在精神病院中結束生命的。再有者，韋伯的一個表弟進過精神病院，而韋伯本人在最嚴重的精神崩潰時，也曾被送到該處。

如果我們想把韋伯的問題看成純粹官能性的，那麼在證據上，我們可以在兩個不同的方向中擇一來探討。我們可以以他最親近的人——父親、母親、愛情、妻子——為著眼點，在他的私人關係中，找出他的困擾；我們也可以把著眼點放在他的社會關係上。

關於韋伯的私人關係，我們當記得他是一個沈默、警覺、聰明超過其年齡的男孩；父母之間日益惡化的關係所造成的壓力，一定曾使他憂忡。他強烈的俠士精神，部份是對父親——在這個男人眼中，妻子愛他，不過就是甘心侍奉他，受他利用和控制——那種家長式傲慢專橫態度的反應。這個情勢，在韋伯三十一歲那年的一次衝突中，達於頂點。當著母親和妻子的面，韋伯竟決定對父親作判決。如果父親不能做到兒子提出來的條件——讓母親在沒有父親陪伴的情況下“單獨”來看兒子——韋伯便將無情地和父親斷絕一切關係。我們前面提過，這次衝突後不久，父親就去世了。這件事使韋伯產生一種無法消弭的罪惡感。若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強烈的奧狄帕斯（Oedipus）的境況，確實不為過。

終其一生，韋伯與母親維持著親密的關係。她有一次稱他為“年長的女兒”（an older daughter）。為了她三子的行為，她熱切求取商量的對象，不是丈夫，而是長子。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韋伯在年輕

的時候，曾經一度渴望在大學裡成為一個真正的粗獷男人。經過三個學期，他在外表上已從一個纖弱、媽媽的乖兒子，變成一個壯實的、嗜喝啤酒的、臉上有鬥劍疤痕的、口叼雪茄的帝國時代典型德國大學生。母親曾因此在他臉上摑了一掌。顯然地，這是屬於父親的兒子。這兩種分別源自父親和母親的認同模型，及其相關的價值系統，從來不會在韋伯的內心生活中消失掉。

另一項類似的緊張，後來造成他的罪惡感，起於他和早年一位愛人的疏遠。這個女孩，是韋伯的一個表妹，他的母親和姨母都很中意。使他更為痛苦的是，他母親滿心歡喜地看著他的一位好友追求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瑪麗安妮。因此，在娶瑪麗安妮這件事上，韋伯為來自兩方面的罪惡感所糾纏：他幾乎準備把他的愛人讓給好友，也幾乎準備娶一位心理有問題、精神不平衡的女人。他在寫給瑪麗安妮的求婚信中，曾討論這個情況；這封信一則示愛，一則也在表白心中的罪惡感。此外，在日後寫給妻子的信中，他總是充滿歉意，因他全力投入學術工作“在內心中的無止運轉”，對他們的婚姻造成了犧牲。

韋伯夫婦沒有子女，不過韋伯不忘在公開場合堅持他的男性氣概，每每在一種突出他身為普魯士軍官之特殊尊嚴的方式下，逕行向別人提出決鬥的挑戰。然而，面對著普魯士的尚武精神，及其軍方官僚支持操縱決鬥社團一類的教育機構，以求“馴服”上層階級的青年，使其習於這方面事業所需的紀律，韋伯在著作中卻不遲疑地公開抨擊。他那深刻的個人人道主義，“基督徒的自由”，以及在倫理方面崇高的標準，來自他對母親的認同。

我們可以撇開韋伯的私人關係及由此而來的困擾，而做另一個方向的探討。韋伯是一個捲入了他週遭的政治事件的知識份子。他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懷，是他自願加諸己身的負擔。憑著一股超乎尋常的責任感，在內心裡，他覺得政治在呼喚他獻身。但是，他並沒有權力、

也沒有地位，讓他的話對政策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種情況，也造成了他內心的某些緊張。

韋伯對德國有強烈的認同，但是看起來，他的這種認同，在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道理。普魯士地主貴族（*Junker*）、工人階級、中產階級中沒有脊椎骨的庸俗之輩（這些人渴望的，是出來一個強人專制領袖《Caesar》保護他們，以免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魔影、和小王朝的家長制統治威脅到他們），都是他大肆撻伐的對象。每當韋伯旅行的時候，他頭一個念頭是離開德國。他經常抱著失戀的人慣有的怨恨心情，對著他覺得是個沒有希望的國家，憤怒地說出永遠不再回來的話。身為普魯士的一名軍官，他對德皇宣誓效忠；但是德皇卻經常是他公開藐視的對象。

只有在很少的機會裡，我們才得窺見滋養他對國家與民族那份愛的是什麼。在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場上，他驕傲地觀看德國所展示的藝術品、工藝品和工業產品，感到德國人的技術、想像力和藝術技巧無人堪與倫比。當在布魯塞爾與四處流動擁護社會主義的工人交往之際，有人告訴他巴黎手藝最高明的裁縫和倫敦手藝最高明的鞋匠，一大部分是來自說德語的奧地利，他深以屬於一批只知致力於工作而罔顧自身利益的工人群中的一份子為榮。

這種態度，讓我們明瞭，他本身禁欲主義式的工作狂熱，牽連到他相信德國人最顯著的特徵，表現在一般百姓和工人身上的庶民風格；他們沒有拉丁貴族門客社交上的溫文優雅，也沒有盎格魯撒克遜紳士由宗教所引發的紀律和崇尚傳統的精神。他之所以全心獻身於工作，是因為他認識到這是盡他作為德國人應盡的責任。1918年11月底，他曾寫道：「我們已經看到[這個民族]所有的缺點了，但如果願意，我們也可以看到它了不起的效率、單純、實際，它追求——不是獲得——“日常生活之美”的能力，和其他民族的迷醉及作戲正成對比」。◎

正如他與父親的關係是罪惡感的一個來源，韋伯生活在德國皇帝的統治下，也使他產生強烈的罪惡感：

因為我們代表那個人的那個政權，作為一個民族，我們現在被外國（義大利、美國、全世界！）鄙視的程度——要緊的是，這種鄙視完全有道理——對我們來說，已經是最重要的、具有“世界政治”意義的一個權力因素了。任何人只要讀幾個月的外國報紙，一定會注意到這個情況。我們被“孤立”，因為那個人用那種方式來統治我們，而我們居然忍受還裝作沒事。在任何意義下心存民主以及民族政治的理想的人或政黨，都不能替這個政權負責任；這個政權的繼續存在，比任何一種殖民地問題，都更危害我們的整個國際地位。^⑩

顯然，韋伯的一生，說明了一個人對政治權威的態度，可能是以他與家庭管教的關係為典範的。我們所要補充的，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一段話：在家庭裡，父親對孩子有愛，報償他對兒子的撫育照料；而在國家裡，統治者統治的快樂，填補了他對人民所缺乏的愛心。^⑪

II

韋伯的政治關懷

新橋譯叢⑩

韋伯選集(I)：學術與政治

著 者 Max Weber
譯 者 錢永祥 林振賢 羅久蓉
簡惠美 梁其姿

發行人 吳東昇
出版者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11樓
電話：5415606~7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523號
印刷者 衆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三二〇元